

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两条路径*

赵 芑¹, 田海龙²

(1.天津商业大学 外语学院,天津 300134; 2.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语言政策研究在从“语言政策与规划”向“语言管理与治理”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关注到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相关文献中“意识形态”概念往往与“语言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鉴于此,文章在讨论“意识形态”与“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和“话语互动”路径,旨在说明前者注重揭示语言政策与规划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后者注重阐释语言管理与治理过程中治理者话语与被治理者话语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治理效果的社会互动过程。文章对提出这两条路径的理念进行了说明,并对其在语言政策话语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语言政策话语研究;话语分析路径;话语互动路径;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23)03-0060-07

一、引言

语言政策研究与(批评)话语研究相互借鉴,发展出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例如,基于对“话语”是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是体现为文本、语体和文体的社会实践的认识,话语研究的学者发展出“语言政策的话语路径(discurs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olicy)”^①。基于对话语研究批评特征的认识,即批评话语研究致力于揭示隐含在话语中的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意义,^②语言政策研究的学者开启语言政策研究的批评转向,提出了“批评语言政策(critical language policy)”的研究路径^③。这些研究路径将语言政策视为话语而非文本,对探究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形态以及语言政策的话语建构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支撑。然而,随着语言政策研究的深入,一些概念在文献中显现得边界模糊,彼此之间的关系不甚清晰;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制约其与批评话语研究深度融合,却也为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整合不同路径,并提出新的研究路径提供了空间。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在语言政策研究的文献中经常被无区分地混淆使用。例如,约翰逊(D.Johnson)在讨论希夫曼(H.F.Schiffman)和斯波斯基(B.Spolsky)对“语言政策”定义的异同时就指出,前者认为语言政策根植于语言信仰和语言意识形态之中,后者则将意识形态本身视作语言政策。^④在这些表述中,“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与“语言态度”“语言信仰”等术语相互替代,同时也与“语言意识形态”概念替换使用。不仅在表述方面,在实际研究的案例中“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的区别也被忽略。例如,瑞森托(T.Ricento)在评论斯普兰德(Van

* [作者简介]赵 芑,女,四川成都人,天津商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话语研究、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

① Barakos E,Unger J.W.Introduction:Why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 necessary?[A].E.Barakos,J.W.Unger.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C].London:Springer,2016:1~10.

② Fairclough N.,Wodak R.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T.A.van Dijk.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C].London:Sage,1997:258~284.

③ Johnson D.C.Language Policy[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39~43.

④ 戴维·约翰逊.语言政策[M].方小兵,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2~6.

Splunder)和莫提默(K.Mortimer)分别做的两个研究案例时,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但却以“语言意识形态”一个概念囊括,并以此为标题展开讨论。^①

“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概念内涵、适用范畴都有所不同。^②“意识形态”是批评话语研究关注的课题,批评话语研究的学者范代克对话语体现在社会主体意识形态的方式和过程都有深入的研究^③;“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人类学研究的课题,西尔弗斯坦关于“指向性”的研究、戈尔和厄文关于“呈符化”的研究都对语言意识形态过程做出了深刻的阐释^④。尽管不同领域对“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的研究非常深入且颇具影响,但是将二者聚合在一起讨论语言政策研究也颇具创新性。因此,本文基于语言政策研究领域关于“语言管理及治理”是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超越和扬弃的论述,^⑤将“意识形态”概念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结合起来,而将“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管理及治理”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本文试图说明“意识形态”在语言政策与规划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在“语言管理与治理”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超越和扬弃过程中,从事语言政策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关注语言政策实施的效果,并已经认识到语言政策承受者的“语言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对语言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可以沿着“话语分析”和“话语互动”两条路径深入展开。

二、“意识形态”与“语言意识形态”概念的异同

“意识形态”概念原本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使用的一个概念,一般与体现“政治纲领”的各种“主义”联系在一起。^⑥在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影响下,“意识形态”概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语言研究学者的关注。例如,福勒等人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大众媒体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创立了后来发展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语言学。^⑦在语言政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批评语言政策”研究倾向,认识到语言政策都是含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是处于主导地位,他们通过制定语言政策将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信仰这些“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推行开来。^⑧

赵芑、田海龙基于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学领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将“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归纳为4点,分别为:(1)意识形态与“意识”和“认知”相关,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主观再现;(2)意识形态的“意识”特性和“心理”特征上升到“思想”或“信仰”的层次,体现社会活动者特定的社会立场;(3)意识形态与“权力”和“斗争”的概念相关联,是确立和保持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重要方面;(4)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以话语的形式呈现^⑨。据此梳理语言政策研究中有关“意识形态”的表述,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和语言政策与规划制定者的主观意图和语言信仰颇为相似。例如,制

① Ricento, T. Commentary [A]. E. Barakos, J. W. Unger.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 [C]. London: Springer, 2016: 275~286.

② 赵芑,田海龙.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

③ Van Dijk Teun A.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191~199.

④ 田海龙.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从“指向性”到“呈符化”的进展[J].当代语言学,2023,(2).

⑤ 戴曼纯.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建构:超越规划与管理的语言治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⑥ Gal S., Irvine J.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⑦ Fowler R., Gunther K., Critical linguistics [A]. R. Fowler, B. Hodge, K. Gunther, ed. Language and Control [C]. London: Routledge, 1979: 185~213.

⑧ 戴维·约翰逊.语言政策[M].方小兵,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35~36.

⑨ 赵芑,田海龙.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

定任何语言政策或是对任何语言进行规划,都体现出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者对相关语言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体现着制定者的社会立场,因此也代表其语言态度和语言信仰。这些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者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具有决定语言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的权力,他们在规定了一种语言形式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与这种语言形式不相匹配的另一种语言形式。最终,他们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权力体现在以文件形式出现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之中,他们的语言态度和信仰也体现在以文件形式出现的“话语”之中。

“语言意识形态”概念具有“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含义,因此,在讨论隐性语言政策所具有的政策意图而非政策本身时,也会使用“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①但是,如果将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管理及治理过程中治理与被治理的社会互动联系起来,聚焦语言使用者和研究者对语言的主观认识,那么,他们“对语言本质、结构以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作出的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的表述”^②,则构成“语言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语言意识形态”概念由语言人类学家西尔弗斯坦基于皮尔斯符号学关于符号与物体之间“解释项”的论述提出。在皮尔斯看来,一个指向符之所以可以指向它的对象,与之建立起指向关系,是因为“它与那些把它当作符号的人的感觉或记忆有联系”,是解释项(interpretant)“猜想”的结果。^③据此,西尔弗斯坦认识到,一个语言特征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某个地区或这个地区的居民),这种语言特征与其对象的指向关系称为“第一级指向关系”(first-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④。在此基础上,西尔弗斯坦进一步指出,这个语境具有某种图示化功能,使人们能够识别出这个语言特征在该语境中是否得体。这种“图示化”(schematization)即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暗含着对这个语言特征是否与它出现的场景适配的认识。例如,在中国高等学校的课堂讲方言而不是普通话是否合适,对这类问题作出判断就是基于特定的“语言意识形态”。在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特定的语言特征就会被赋予社会意义,如方言在中国高等学校课堂使用会被认为不合适,或者说大学老师在课堂讲课使用方言会被认为没有使用普通话更合适,或会被认为没有使用普通话更能体现其大学老师的身份,更能赢得尊重,等等。这时,该语言特征与这个在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下产生的社会意义便形成一种新的指向关系,被称为“第二级指向关系”(second-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第二级指向关系”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于该语言变体“第一级指向关系”的结果,这种语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受“民族元语用驱动”(ethno-metapragmatically driven)对语言特征进行的“本地解读”(native interpretation)^⑤。当“第二级指向关系”中指向符(如方言)的子特征依据其他意识形态图示被认为具有其他的指向意义时,如当人们不仅注意到将某个方言指向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而且注意到这个方言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意义(如不宜在大学课堂使用),这时,如果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图示(诸如“每个地方都有方言,听到一种方言就可以知道说这种方言的人来自那个地方”的认识)也发挥作用,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言谈中使用这种方言,以显示自己来自那个地方。这时,使用这个方言也创造出第三级指向关系(third-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即使用该方言的意愿与听起来具有地方性的言谈之间的联系。这里,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和建构性上面。例如,大学教师如果要构建自己的独特语言风格,或构建自己的乡土身份,抑或挑战特定的语言政策,如大学教师授课需使用普通话的规定,那么,他就会在大学课堂模仿使用某种方言。

① 方小兵.何为“隐性语言政策”?[J].语言战略研究,2021,(5).

② Irvine J. When talk isn't cheap: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89, (2).

③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56.

④ Silverstein Michael.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003, (23).

⑤ Silverstein M.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003, (23).

由此可见,“语言意识形态”与批评话语研究所要揭示的、隐含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源头看,“语言意识形态”是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解释项”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意识形态”则是源自政治学中的概念。从它们与语言使用的关系来看,“语言意识形态”不像“意识形态”那样是批评话语研究和批评语言政策研究揭示的对象,而是一个在社会活动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mediating force)的概念,对于探究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具有实际意义^①,特别是在探究话语互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对于互动后果的影响具有意义。例如,田海龙在剖析中医话语与西医话语相互作用的过程时认识到,西医话语对于中医话语的影响,以及中医在其对国际化和标准化追求过程中对西医话语的依赖,都需要通过中医执业者自身对西医的认识来实现。换言之,中西医话语互动的结果不是中西医相互作用直接导致的,而是通过参与话语互动的社会活动者自身的“语言意识形态”间接实现的^②。

认识“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的区别,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语言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形态”是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一个研究课题,还可以更为明确地表明语言政策话语研究需要通过语言政策接受者的“语言意识形态”来探究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以上关于“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的讨论促使我们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两条路径,即“话语分析”路径和“话语互动”路径,前者注重揭示语言政策与规划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后者注重阐释语言管理与治理过程中治理者话语与被治理者话语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治理效果的社会互动过程。

三、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

采用“话语分析”路径进行语言政策话语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所涉及的语言态度和信仰被理解为语言政策和规划制定者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以及与之形影相随的语言政策制定者的权力和权威,虽然并非总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直接体现,却也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课题,从话语的角度进行语言政策研究,就有必要将这些隐含的意识形态揭示出来,进而认识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目的。这样的“语言政策话语研究”在理论上遵循批评话语研究的理念和原则,对特定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并依据批评话语研究的分析框架,对这些隐含在语言政策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真实含义作出阐释,揭示其发挥作用的社会语境,以及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共同作用的机制。在这方面,斯普兰德对弗兰德斯和芬兰“将英语定为高等教育用语”的话语分析即是一个典型研究案例。该研究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两国宪法、大学教育政策以及芬兰的捷瓦拉大学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文件中涉及语言政策的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发现这些文件都将本国语言表述为“官方语言”,是大学教育中使用的语言,而“英语”则没有被两国宪法、大学教育政策和文件直接提及。对此,该研究认为,这些对语言的不同指称、命名和标签体现出话语对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建构,“英语”没有被直接提及体现出它所代表的“他者”身份,这种命名策略建构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如此对语言政策进行“话语分析”,作者发现,荷兰语被表述为在弗兰德斯使用的唯一官方语言,芬兰语也被表述为在芬兰使用的唯一官方语言,这都体现出注重语言地域性的单语主义的意识形态。“英语”在语言政策的文件中没有被直接提及,仅是被表述为“其他语言”,构建出“他者”的身份。这表明,虽然英语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巨大,但是弗兰德斯和芬兰这些语言敏感地区对于其他语言地位的挑战还是很警惕的。^③ 尽管在研究中斯普兰德并没有刻意区分“意识形态”和“语言

^① 赵芃,田海龙.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

^② 田海龙.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话语研究——基于“双层-五步”分析框架的中西医话语互动分析[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2).

^③ Van Splunder F. Language ideologies regarding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sights from Flunders and Finland[A]. E. Barakos, J. W. Unger,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C]. London: Springer, 2016: 205~230.

意识形态”,但是他用“意识形态”指隐含的、可以形塑价值、规范和政策的信仰和假设,用“语言意识形态”指在话语中谈论某个话题的方式,^①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个案例研究阐释了谈论一个话题的方式所形成的语言实践不仅体现着意识形态,也体现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案例研究具有批评话语分析揭示话语社会实践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在语言政策与规划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并非在早期的语言规划理论中受到重视。许多早期的语言规划理论提倡语言规划应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试图将语言规划与语言运用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现实割裂开来。这些理论受结构主义或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过分专注于政府部门有意识的语言规划,所采用的研究框架忽略了被规范的语言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后,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批判理论和话语理论影响下,特别是在语言学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影响下,语言政策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规划的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性质,认识到语言政策与规划体现出制定者的诸多意识形态取向,如促进性取向、权宜性取向、宽容性取向、限制性取向、压制性取向,等等。这里的“取向”,即是对谈论语言和语言问题方式和语言态度范围的一种界定,暗示出“语言政策都是含有意识形态倾向的”^②。它是一种话语,在以霸权方式将某些特定的理念、现状和教育形式标准化和正规化的同时,也将另一些理念、现状和教育形式划定为他者。由于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创造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特征,体现为政府文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也是一种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带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此背景下,约翰逊提出“批评语言政策”研究,将语言政策和规划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凸显出来。他强调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强调语言政策和规划制定者的意识形态可以引发社会不平等,指出“批评语言政策”研究应该聚焦如何揭示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约翰逊提出的“批评语言政策”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旨在揭示语言运用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内容颇为相似。但是,约翰逊主要论述了批评语言学、批评社会语言学、批判理论等对语言政策研究的学者提出“批评语言政策”的影响,并没有深入讨论如何在批评语言政策研究中如何对政策文本进行深入的话语分析。因此,我们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就是要强调在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文本及其产生过程进行分析时要运用语言研究的方法,如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同时遵循批评话语分析的分析框架,如“辩证关系”分析框架或“话语-历史”分析框架,^③只有这样才可以认识语言政策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创造的不平等关系。

四、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互动”路径

如果说注重探究语言政策与规划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构成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那么,注重探究语言管理及治理如何通过受众的语言意识形态获得预期效果,就需要采用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互动”路径。“话语互动”是社会活动者通过使用一定的话语策略相互影响的过程。^④由于话语体现为语言使用的特定形式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便体现在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两个层面。在语言使用层面,一个话语作用于另一个话语,该话语中的语言使用形式就会被“再情景化”到另一个话语的语言使用层面,而这个话语中已经存在的语言使用形式也会与新植入的语言使用形式产生融合或挪用,形成一种语言使用层面的杂糅。在这个过程中,两个话语所具有的权威及其彼此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如体现为两个话语主体所具有的不平等地位,对于造成语言使

^① Van Splunder F. Language ideologies regarding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sights from Flunders and Finland[A]. E. Barakos, J. W. Unger,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C]. London: Springer, 2016: 207.

^② 戴维·约翰逊. 语言政策[M]. 方小兵,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34~36.

^③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 (2).

^④ 田海龙. 话语互动——批评话语研究新课题的多维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 (3).

用层面的杂糅具有潜在的力量。但是,这种杂糅最终是否出现以及程度如何,则取决于社会活动主体对使用某个语言形式所要达到目的的主观认识。这种认识,即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元语用模型”,它对话语互动过程中产生新意义的作用不可或缺,^①同时,也是进行话语互动分析“双层-五步”分析框架的重要步骤^②。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是莫提默(K.Mortimer)对巴拉圭语言政策的研究。巴拉圭的国家宪法规定,“学校教育应该使用官方语言,即学生的母语西班牙语或瓜拉尼语”。对此,人们会产生特定的理解,如教育指什么,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的形式和发音是什么样子,学生和社会生活中使用这两种语言时会是什么身份,在本地使用语言是什么身份,在外地又是什么身份,即时使用是什么身份,长久使用又是什么身份。这些理解还可以引发其他的理解,如教师在教学中怎样做才算是“教育”;西班牙语有适合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地区和地方层面的多种变体,哪种才算是当地的“卡斯提尔语”;巴拉圭本地语言的哪种土语,在国家、地区、地方层级使用的哪种语言才算“瓜拉尼语”;来上学的学生语言能力各种各样,哪些才算是讲瓜拉尼语的学生或讲西班牙语的学生。人们对国家层面语言政策的解释体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之中,通过“语言意识形态”或“元语用模型”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判断,并影响语言政策的实施,如影响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和学校在课堂决定谁在什么时间和场合说什么语言^③。可见,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作为话语如果要在语言管理和治理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其自上而下对学校的语言政策话语的作用就需要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在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中作出如何挪用和再情景化的反应。而探究这个过程运作的机制,“话语互动”分析路径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

以此为出发点审视语言管理及治理,我们会发现,语言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语言管理者如政府和企业等机构,以及家庭成员等个体和被管理者如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④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关系。拥有或声称拥有特权的语言管理者所制定的语言政策,作为一种具有权威的话语,如果要收到既定的管理效果,并非依靠其话语具有权威,而是要通过被管理者自身的“语言意识形态”发挥“调节力量”来间接实现。在这个“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中,被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语言管理的效果,同时也预设出这种语言管理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与此同时,体现为“语言意识形态”的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存在于语言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于语言治理过程中。正如戴曼纯指出的那样,在推崇民主执政的现代社会,语言治理鼓励多元主体以相互协商的方式参与治理过程,而不应成为拥有权威的管理者和治理者强迫被管理者和被治理者接受其管理和治理。^⑤就参与主体而言,他们处于不同的层级,一个层级的被管理者可能同时对于另一个层级来说又是管理者,他对于语言政策的主观认识不仅影响上一层级的语言治理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对下一层级的语言治理。因此,他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一个研究语言管理及治理所关注的问题,在“语言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尚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⑥的背景下,或许进一步探究被治理者语言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是一个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契机。

① 田海龙. 社会网络中的话语互动[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169~172.

② 田海龙. 批评话语研究之“话语互动”新路径[J]. 外语学刊, 2021, (2).

③ Mortimer K. Language policy as metapragmatic discourse: A focu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A]. E. Barakos, J. W. Unger.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C]. London: Springer, 2016: 71~96.

④ 张治国. 对语言管理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 外语学刊, 2020, (3).

⑤ 戴曼纯. 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建构: 超越规划与管理的语言治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⑥ 戴曼纯. 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建构: 超越规划与管理的语言治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五、结 语

“语言政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术语,在本研究中既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又包括语言管理与治理。如此认识“语言政策”的概念,不仅可以清晰地显示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还可以为讨论“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在语言政策研究中不同的含义奠定基础。本研究将语言政策和规划制定者的语言信仰理解为“意识形态”,而将语言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管理与治理对象对语言政策的主观认识理解为“语言意识形态”,可以澄清这两个术语在语言政策研究相关文献中的混用问题,也可以进一步厘清语言政策研究领域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基于此,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可以采取“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揭示语言政策中隐含的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威;如果侧重语言管理及治理的研究,则可将管理与治理对象的“语言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观察的维度,采用“话语互动”研究路径探究管理者的话语与管理对象的话语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探究语言管理与治理如何通过管理对象的“能动性”实现管理和治理的预期效果。以这两条路径为内容的“语言政策话语研究”,整合了现有的“语言政策的话语路径”和“批评语言政策”研究路径,使得“语言治理”对于“语言规划管理”的超越不仅体现在戴曼纯阐释的研究内容上面,^①更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研究范式也可以推动话语研究的发展。在语言治理过程中,被治理者体现在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中的“能动性”对于“结构”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宏观”“微观”二元对立这种现代主义观念的消解,代表着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和理论聚焦^②,在丰富语言政策研究理论内容的同时也可丰富和发展话语研究。

Two Approaches in Discourse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y

ZHAO Peng¹ & TIAN Hailo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has already dealt with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the language policy-making process as it develops from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to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However, ideology and language ideology as two separate concepts have often been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some literature. Thu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and then proposes two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namely, the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that i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ideologies and power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policy making and planning, and the “discursive interaction” approach that is to unpack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pervisor and the supervise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The rationa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proposal is discuss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discourse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discursive interactional approach; ideology; language ideology

[责任编辑: 和智利]

^① 戴曼纯.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建构:超越规划与管理的语言治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② 田海龙.“语言”与“社会”的互融: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与理论聚焦[J].山东外语教学,2022,(5).